

黄玉琴 等著

当代中国和印度社会 比较研究

DANGDAI
ZHONGGUO HE YINDU
SHEHUTU BIAO YANJIU



四川大学出版社

黄玉琴 等著



当代中国和印度社会
比较研究

DANGDAI
ZHONGGUO HE YINDU
SHEHUI BIJIAO YANJIU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 燕
责任校对:陈 蓉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和印度社会比较研究 / 黄玉琴等著. —成
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8. 2
ISBN 978—7—5690—1614—7

I. ①当… II. ①黄… III. ①社会发展—对比研究—
中国、印度 IV. ①F135. 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5447 号

书名 当代中国和印度社会比较研究

著 者 黄玉琴 等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1614—7
印 刷 成都市新都华兴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13
字 数 347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的部分研究受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来华印度商人的跨国网络和融入适应研究”（16BSH017）的资助；其出版部分受2016年华东理工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科研团队建设基金项目（WE1623103）的资助。

前　言

在整个 20 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亚洲各地的知识圈眼睛都是往欧美看，形成了一种知识上的“欧美中心主义”。但近期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国及印度作为主要成员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产生了一种在欧美之外的地区开展出一种“替代性的参照框架”的需要^①。这其中，中国和印度因具有相似的背景、相近的现代性追求轨迹和发展道路而具有较强的可比较性。目前国内学界与印度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块：一是人文（哲学、思想、宗教等），二是（与中国的）国际关系，三是经济发展。从社会学的视角对当代印度社会进行分析和剖析的国内论著非常少，而从社会学角度对当代中国和印度社会进行比较性分析的则几乎没有。

本书最初的动力来源于 2015 年 3 月访印与印度学者的首次交流。那次访问让我们意识到有必要更多地了解印度社会，并以一个比较的视角，立足于我们所知晓的中国经验的角度去了解；在此基础上，再反观中国自身的经验。那之后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成立了“中印社会比较研究中心”，将“中印社会比较”作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来发展，并开始逐步开拓与印度学人的合作研究。这本著作是近两年的时间内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本书致力从社会学的角度比较中国和印度社会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发展道路与制度、城乡发展和政策、劳动与社

^① 陈光兴：《作为方法的印度》，《读书》，2010 年第 12 期，第 6~15 页。

会组织、社区与社会治理、医疗教育与法律、性别与儿童发展、文化与精神等方面相似及相异的经历，并追问这些异同背后的原因及对两国的意义。本书的部分文章曾在《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中印比较研究”专栏文章的形式发表过。这些文章在此次收录入此书时经过了修改。

自“一带一路”倡议推出以来，印度成为该倡议的推进过程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本书希望抛砖引玉，引起更多学者从比较的视角研究现当代印度社会的兴趣。我们坚信，这种比较有助于我们反观中国社会的发展，并帮助我们在一种“替代性参照框架”的基础上反思既有的发展模式和学术范式。

目 录

道路与制度

- 第一章 印度归来话中印比较 (3)
第二章 中国和印度：成就不同的制度根源 (16)

城乡发展和政策

- 第三章 保障农村就业——两个国家的故事：新自由主义
 印度的就业权和中国集体时代的劳动积累 (53)
第四章 中国和印度的扶贫：近期趋势的政策含义 (83)
第五章 中印城市规模、城市化时空变迁及其动力机制的
 对比研究 (118)
第六章 中印两国非营利部门的比较：一个初步的探索
..... (140)
第七章 城市建筑业的包身工：印度和中国的新劳动制度的
 形成 (161)

社区与社会治理

- 第八章 中印大城市摊贩治理：行政化排斥与政治性接纳
..... (191)
第九章 比较中印两国基层政府：起源、历史和发展 (210)

医疗、教育与法律

- 第十章 中印药业发展比较 (225)
第十一章 中印人力资本竞争力的比较分析 (239)
第十二章 中印反倾销正常价值确定规则比较 (261)

性别与儿童发展

- 第十三章 发展与性别平等：一个中印比较的视角 (277)
第十四章 中国和印度的乡城迁移和儿童医疗保健的性别
差异 (303)
第十五章 中印比较视角下的“失踪女孩”现象：历史、
现状和政策 (329)

文化与精神

- 第十六章 中印比较视野下的现代性、民族主义、精神
与世俗——Peter van der Veer 思想述评 (349)
第十七章 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印度人与中国人形象 (368)
第十八章 作为现代国家手段的市场与传统：中、印经典
文本影视剧比较研究 (384)

道路与制度

第一章 印度归来话中印比较

2015年3月我们一行四人赴印度国家农业研究院参加学术会议并进行了几天的调研。以下是从印度回来后的一些感想。对印度的关注大概已经持续十几年了，在国内学术界，我大概还算比较早的一个。大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独立国家，一般来讲都把眼光放在西方，放在美国，就像全国各个省市都把眼光放在北京一样。各个国家之间相互看、相互学习，这个确实比较少。但是随着中国、印度这些国家的崛起，这些相互看的要求，开始在中国和印度出现了。如果要比较的话，将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当然是一个视角，中国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则更为重要，因为两者的相似性更多，遭遇的问题更相同。所以十几年前，我一般主要是纸上谈兵了，因为多次想要到印度去没有机会，就找了相关书籍，凡是翻译过来的印度的著作大体上都看了，所以对书本上的印度知识大概有一点。这次去看，只是跑了一个中南部的海德拉巴，而且只是里面的一个点。信息非常有限，有几点观感，向诸位汇报。

第一个，三天会议当中我最大的感受之一（当然也出乎我的意料），是印度学者的讨论总有一个或明或暗的中国背景，而在中国二十几年来我所参与的会议当中唯一的背景是西方背景。印度学者讨论印度问题的中国背景，是最近几年来或者宽泛点讲十年形成的，因为印度讨论印度问题原来也是以西方为背景的，而中国讨论中国问题不会有印度的视角，这是我最突出的一个感

受。印度学者讨论印度问题以中国为背景，是以中国为尺度，以中国为模范，用中国的发展经验（这里是指成功的经验）来说印度的事。所以，参加会议时虽然我不动声色，却心中暗喜：中国是长期被西方指责的国家，我们是长期输入西方标准的国家，现在经过六十年的发展，被另一个大国作为尺度。而目前中国进一步的发展，能不能成为世界的尺度？我们研究中国问题，以中国为中心，大体上没有问题，但是以中国为尺度一直是一个问题。所以，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确实是以中国为中心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却以西方为尺度。聪明伟大如毛泽东，也是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以西方的马列主义作为中国的标准来改造中国，更何况一般的学说。会后的交谈里面确实隐藏着印度是一个很骄傲的民族，他的自尊心绝对不亚于我们，但是在中国的同行面前，他的设定是明确的，即多讨论中国这个标准。我们中国这六十年的发展确实取得了正面的成果。而有的中国学者关注中国的负面效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大量的负面信息。当然学者关注一个国家的负面东西，从关注问题角度出发，那是常态，但是以此来否定中国整个六十年来的实践，那就大逆不道了。所以，印度不断地把中国设定为标准，当一个民族把另一个民族设定为标准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它有浪漫化的可能，即把我们没有的优点也作为优点的这个可能，就是说他们讲中国如何好的时候，其实把中国浪漫化了。反过来讲，我们把西方设定为标准的时候，也把西方的标准浪漫化了。那些标准不存在西方的现实里面，而在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想象里面。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最突出的感受。

第二个感受，是印度学者在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印度建国以后发展比较的时候，高度关注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尤其是最后一个总结发言的（他的发言时间最长，一个半小时，一般我们的发言时间为半个小时或者二十分钟，因为他长期从事中印比

较研究，对中国很熟悉，在中国的学术界有很多的朋友，所以，印度的学术界把他当作权威请来做最后的总结发言），他的题目是从印度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发展。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为后三十年的成功转型奠定了制度性的基础，这个制度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印度人讨论印度问题，来设定中国北京的时候，把视线投向了前三十年，待这位教授发言结束以后，要我们给出一个评论。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不大清楚，但是我本人是基本同意他的观点的。从他权威性的总结发言可以看出，关于前三十年的制度安排对后来有什么影响，他们集中关注的一点就是土地制度，就是土地。中国是 1950 年进行土改的，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地主所有制，紧接着消灭了地主阶级，这对后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而国内的学者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有声音说，我们消灭了传统，然后给中国后来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道德失衡问题带来很大的影响。而和印度比较，印度传统的延绵性，令印度学者感到惊讶，那么顽强。印度的左翼，就是前面介绍过的那个印共，基本上分成两派，一派是毛派，一派是马列也就是苏联那一派。苏联这一派后来在印度成为合法的政党，因为他放弃了暴力革命和土地，在几个邦还长期执掌政权。毛派的那一派就在东部的那些山岭，退守到丛林里面，然后还是顽强地坚持土改，是属于印度要剿灭的力量。至于海德拉巴，他认为是第三派，是继承马列毛的这个派别。他们的观点是（当然不是学术会议上的观点，学术会议上一般比较温和）：印度海德拉巴这个派别，更强调土改的问题，而印度没有实行土改。这个话当然也有些问题，印度实际上在尼赫鲁时期实行过多次以“限田”为中心的土改，限田就是说你有五百亩，那么另外的四百亩就要拿来分掉。它的限田制改革，实际上是改良，内容是改革，但不是革命。一些印度的历史经验证明，用改良的方式从事改革，大体失败。只有革命有可能成功，因为历史上在中国最早提出限田的是

董仲舒。董仲舒明白恢复传统的井田制就是土地国有，农民均分的那种土地制度不可能了，所以采取限田制。在唐以后这个限田制不断地出现在儒家知识分子的议论当中，宋以后限田制也不可行，然后采取均税制，那是王安石改革的实质。对于印度采取限田制，他们的判断是失败了，当然个别的地方，有些地主的荒山、荒地，就是没有农业产出的那些地，是有分掉了的，并不是完全没有实行。但是农民得到的土地，一般来讲只能是极差的，我提出这一点，他们都笑了——农民只能得到极差的地，所以他的这个土地制度没有得到改革。

在印度的发展过程当中，只把英国人赶走了，但把传统保留下来了；中国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而印度只有反帝没有反封建。“封建”的内容极其宽泛和混杂，因为在中国的反封建主叙事当中，是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而把地主所有制当成封建的核心内容，这在 1927 年到 1937 年的土改当中表达得尤其明确。我们原来的那个叙事里面是把地主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作为封建的核心内容。在印度，左翼就是共产党曾经提出这个叙事，但没有被推行，所以他把英国人请走了以后，原来的这个结构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个结构成为他的核心领导力量。这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领导力量转变，整个阶级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动的情况不同，所以印度的整个传统保留下来了。我们的印度之行还碰到一个人，中印友好医疗协会的秘书长，我们习主席去年去访问印度的时候，还给他颁奖了呢。大家知道印度有一个在中国名声仅次于白求恩的人物——柯棣华，这个人在印度也有点名气。在他们的叙事里面，1947 年的解放就是独立，前面也有一个激进的叙事，他们想用阶级叙事来替代那个种姓结构。因为他是按照阶级来划分的，阶级的底层推翻上层，这样来实现平等，传统的种姓制度也可以在革命当中消失，但是没有。他们一直对印度出现的这个问题（我讲印度海德拉巴的）耿耿于怀，说中印的岔道

从这里开始：中国开始土改了，他们没有土改，这样他的种姓制度尤其是宗教得以完整地保留。这场共产党的彻底革命到底给中国以后带来哪些正面的以及负面的东西，要按照印度的经验重新审视。因为我们原来都是革命的叙事。改革开放以后都是自由派的叙事。这两个叙事已经杂乱起来，尤其是自由派的叙事占据主导地位。反过来从印度那里看，当然原来的革命叙事固然有很多理想教条色彩，但是从印度的视角来看这场革命，它确实将阻碍现代化的这个传统割断了，在这里割断了联系。阶级叙事对于中国后来的发展却重要得多，虽然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废除了阶级斗争，也废除了阶级斗争叙事，改用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叙事。

在我看来，印度的土改注定不能成功，原因在于它的种姓制度，即三千年种姓制度的强大。我以为种姓制度在当代的印度只在农村存在，他们说不，在城市也存在，蔓延到城市里面去了。而且有印度学者讲，印度的工业化之所以落后于中国，很大的原因是和种姓结构有关系。我回来以后再查了一些和印度有关的史料，才发现这一点。历史上在中国的社会结构里这叫作士农工商，长期以来我们采取的是重农抑商的政策，商的地位比较低。这个商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并不是说他们集聚财富的能力也弱于农民，所以实际的地位是平衡的。宋以后，士农工商的流动在法律上也打通了。他们也问我们中国整个类似于种姓结构的情况，我的回答讲了三点。

第一个是陈胜的故事。陈胜是一个雇农，在为地主干活的时候他发了一句牢骚，这个怎么被司马迁记录下来了我们不知道。他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个“种”可以理解为种姓，就是说固定化的等级制度。中国那个时候没有“种”，而印度那个时候已经建立起牢固的种姓制度。佛教的出现主要是想对抗这个种姓制度，所以倡导众生平等。那么为什么佛教在印度退出？佛教在公元5、6世纪就开始衰败，在8、9世纪以及10世纪以后就全面退出印度。我这次第二个深刻的领悟，是种姓制度和村落制

度的结合，使得佛教反对种姓制度的时候高唱众生平等，同时退出村落的那种经济生活，所以早期的佛教徒都是流民和乞丐。到了几百年以后，他获得了土地也获得了寺庙，种姓结构也在佛教内部蔓延，这也是导致佛教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印度教，主要是从为种姓服务的婆罗门教转化来的，虽然也吸收了佛教的一些教义。所以，10、11世纪以后，印度教成为印度的主流宗教，佛教在印度本土消失。当然伊斯兰教也大规模地入侵印度。

第二，宋代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上、下流动，按财产的多寡来作为户等的等级，作为征税和均役的单位，出现了民谣“千年田，八百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富不过三代”等言论都出现在宋代，就证明这个流动性，法律严管的等级在中国已经全部消失了。

第三，1950年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第二部就是《土地法》。第一部法律规定性别的平等，第二部法律规定主要财产土地的平等分配，这两个平等在中国以革命的方式加以实现，确实与印度反差很大。我们参观的那家农户，女主人是个婆罗门，是个高种姓的，男主人原来有二十一英亩的土地，是属于中等大的地主了。这个规模也不算小，一百二三十亩地。这体现了种姓制度和村落制度结合的强大。在印度教里面，我还研究了一下等级的分配，婆罗门是宗教第一，然后从事政治、军事活动的叫刹帝利，属于第二，第三是商。婆罗门是经商的，所以印度的商业历来很发达。自古以来，印度、马六甲海峡一直到阿拉伯海、波斯湾那一带，都活跃着印度商人的影子。所以印度的佛教向整个东南亚传播主要靠商人，而不是军队。后来小乘佛教向南传播，到斯里兰卡，到缅甸，然后覆盖整个印尼，进入菲律宾，也主要是靠商人传播。再下面是农，再下面是工，所以一些从事比较低端的行业的，比如焚化尸体、宰牛做皮革等手工业的绝大部分人，不是低等级，都认为不是低种姓，而士下面的第五种姓

就由贱民来承担。也即职业的划分和种姓的划分是高度一致的，这是印度学者讲的，不是我们掰出来的，就是说种姓制度影响了工业的发展，所以他进入商业，进入IT产业没有问题，这是印度学者的观点，对不对由他们来负责，不是我们来负责。那么在中国来看，士农工商，宋以后无贵贱之分，但是收入有贫富之别，当我们说某个职业贵或者贱的时候，其实是说它的报酬的高低，因为报酬低所以它比较贱，因为报酬高所以它比较贵。而印度不是这样的。这个职业本身有高低贵贱之分，和其报酬结构之间当然也有强弱不等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和韦伯的阶级分析结构，在印度就呈现了极为复杂的图景，我以后有机会去还要研究一下。你可以用这样的西方语言来讲：印度的等级结构向阶级结构过渡特别艰难，那么中国从宋代以后原有的春秋以前的等级制经过了一千年的演变，到了宋代以后已经完全为阶级结构所取代，而阶级结构按照财富占有的多寡、土地的多寡划分。

另外是水的问题。关于土地制度与农田水利建设，我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感受。中国土改以后的合作化运动，尤其是人民公社这样一个土地制度安排对于农田水利建设是有利的，这里指的就是地表水的储存与地表灌溉系统。地表水的储存就是指搞水库了，当然中国南北也有差异。北方平原大量还是利用地下灌溉，南方尤其是丘陵山区那一带，历史上主要利用地表灌溉，如利用池塘什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地表灌溉系统的发展更厉害，建议各位尤其是安徽的，以后去大别山看看那五个水库，我讲淠史杭的整个灌溉系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花了十年工夫建立的特大灌区，就是一千万亩以上的特大灌区。全中国有三大灌区，第一大灌区自秦汉就开始修建了，我这里指的是成都平原都江堰工程；第二大灌区就是从晚清一直到民国不断存续的河套地区的灌溉系统，也是一千万亩以上；第三大灌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治淮而建立起来的淠史杭灌区。为